

# 元結寓言析論

顏瑞芳

## 一、前言

中國古代寓言之發展，始盛於先秦，式微於兩漢，消沉於六朝，復興於唐宋<sup>①</sup>，轉變於明清。源遠流長，題材廣泛，風格多樣，故論者謂：先秦哲理寓言，兩漢勸戒寓言，唐宋諷刺寓言，明清詼諧寓言，共同構築成一條宏偉絢麗、曲折變化之藝術長廊。<sup>②</sup>

寓言至唐宋而復興，與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關係。換言之，寓言復興乃是古文復興之一環。因「寓言」乃兼具故事與寓意之文體，而故事的鋪敘，較適宜藉散文表現，是以六朝駢儷盛而寓言衰；隋末唐初以來，古文漸興，寓言亦漸盛。自貞觀年間，謝偃作〈愚夫哲婦論〉，其後盧照鄰〈窮魚賦〉、裴炎〈猩猩銘序〉、李華〈鸚鵡狐記〉等寓言佳構相繼出現，如桃李綻放於早春。惜謝、盧、裴、李諸人所作寓言，為數不多，未足名家。第一位大力創作寓言而成就可觀之唐代古文家，厥為河南魯山元結。

## 二、元結之生平、時代及文學觀

### (一) 生平

元結，字次山，始號元子，繼稱犄犴子、浪士、漫郎、聾叟，後稱漫叟。生於玄宗開元七年，卒於代宗大曆七年（西元七一九～七七二）。其先為後魏拓跋氏，自次山高祖以下，皆在唐朝為官，代居太原。父延祖因魯山縣商餘山多靈藥，遂移家魯山<sup>③</sup>。

①鄭振鐸〈寓言的復興〉云：「到了明時，寓言的作者，突然有好幾個出現，一時寓言頗有復興氣象。」（文見《中國文學研究新編》，明倫出版社，頁一二〇七）以為寓言復興於明朝；陳蒲清《中國古代寓言史》則云：「唐宋是中國古代寓言創作的復興時代。」（駱駝出版社，頁一七三）陳說較得其情。

②參陳蒲清《中國古代寓言史·小序》。

③關於元結詳細生平，請參孫望《元次山年譜》（世界書局《新校元次山集》後附）、李建崑《元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學》（台灣商務印書館）第一章。本節所述，著重於與其寓言創作相關者。

次山少時僮不羈，十七歲始折節向學，師事從兄元德秀。德秀嘗爲魯山令，性情狷介質樸，有名於士大夫④。天寶六年（西元七四七年）丁亥，玄宗因承平日久，欲廣求天下士，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，次山乃赴長安，著《皇謨》三篇，論陳其淑世昌國之宏圖。時相國李林甫柄政，以朝野之士猥多，恐洩露當時之機，議於朝廷曰：「舉人多卑賤愚瞶，不識禮度，恐有俚言，汙濁聖聽。」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，試如常吏。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，遂表賀人主，以爲野無遺賢⑤。次山悵然將東歸，鄉人有苦貧賤者，欲留長安依託時權，徘徊相謀，乃諭之曰：「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，則介潔靜和以終老。」鄉人於是偕歸。因而感嘆：「貴不專權，罔惑上下；賤能守分，不苟求取，始爲君子。」次山方正介潔之思想性格，頗有德秀之風，而其寓言作品中所呈現之主題、風格，實根源於此種人格特質。

天寶七年，次山復遊長安，對於時人夤緣權貴、貪婪苟取之醜態，有更深刻之感觸，作《丐論》、《寤論》以抒憤激、矯時俗。九年至十二年間，因多病習靜於商餘山，自稱元子，著《元子》十卷，是其隱居求道，學行俱進時期，作有寓言《心規》、《戲規》、《處規》、《出規》、《惡圓》、《惡曲》、《訂司樂氏》、《時化》、《世化》、《述時》、《述命》、《述居》等，身在山林，而心憂黎庶，有高世之才而不得用，故辭多怨懟鬱悶。章學誠云：「《元子》作於天寶乙未以前。次山之才，壯歲不獲一第，故本屈騷之志，而蕩肆於莊周之寓言。」⑥可謂知言。天寶十二年，次山三至長安，次年春，擢進士第，後仍居商餘。十四年安祿山爲亂，乃舉家避難於猗犴洞（在今湖北大冶），後又遷居於灤溪（湖北瑞昌），自號浪士，作《浪說》七篇。

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，肅宗問天下士，國子司業蘇源明薦次山可用，召詣京師，於是作《時規》，上《時議》三篇，悉陳兵事。肅宗悅，擢爲右金吾兵曹參軍，攝監察御史。三年，理兵泌南，見安史亂後「殺傷勞苦」、「街郭亂骨如古屠肆」之

④《資治通鑑·唐紀三十》載玄宗開元二十三年：「時命三百里內刺史、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，各較勝負。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，皆衣文繡，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。魯山令元德秀惟遺樂工數人，連袂歌《于菀》。上曰：『懷州之人，其塗炭乎？』立以刺史爲散官。德秀介潔質樸，士大夫皆服其高。」德秀卒於天寶十三年，次山作《元魯縣墓表》，曰：「於戲！吾以元大夫德行遠來世清獨君子、方直之士也歟！」

⑤事見《新校元次山集》卷四《喻友》、《資治通鑑·唐紀三十一·玄宗天寶六載》。

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，守正和仁讓之分。」

上元元年（七六〇），辭監察御史，任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，作《漫記》七篇。次年，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，乃撰《大唐中興頌》。代宗寶應元年（七六二），因老母久病，乞免官歸養，居武昌樊水之郎亭山下，放情山水，耕釣自娛，漁者稱為「鰲叟」，酒徒呼為「漫叟」，作《自釋》、《漫論》以自嘲。

廣德元年（七六三），次山奉詔任道州刺史，明年至道州，作《舂陵行》，有序云：「道州舊四萬餘戶，經賊已來，不滿四千，大半不勝賦稅。」因進《免科率狀》，請免百姓租稅。永泰元年（七六五），罷守道州，赴衡陽，時孟士源鎮湖南，建茅閣，次山為作《茅閣記》，寓賢人當效茅閣之蔭麻蒼生。明年，復任道州刺史，其寓言小品《菊圃記》當作於是時。

大曆三年（七六八），奉勅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。四年，丁母憂，居涪溪守喪，杜門謝客，生活清簡。七年，朝京師，遇疾卒，享年五十四。贈禮部侍郎。

綜觀次山生平行事，正如砥柱屹立於濁流之中，一心唯以匡時濟世為念，因其憂世殷摯，故憤世沉深。章氏謂其「與時椎擊，其心切於憤世，故氣尤亢。」<sup>⑦</sup>錢基博評其「性不諧俗，制行高潔，而閱時憂國。忠誠之意，形於筆墨。」<sup>⑧</sup>次山寓言諸作，正是其秉筆為劍，針砭時弊，諷刺時俗之集中表現。

## （二）時代

盛唐中唐之際，就政治局勢言，是大唐帝國由盛轉衰之關鍵時期，安史之亂使國力大傷，政局動盪。就社會民生言，大亂之後必有凶年，盜賊過處，燒殺劫掠，生產停頓，而府庫空虛，急徵暴賦，民不聊生；就文學風氣言，古文運動正逐漸興起，風雅寄興、宗經明道之文學主張逐漸抬頭。

唐代政局之敗壞，肇端於開元末年以後，玄宗因在位日久，怠荒政事，佞信李林甫，重用安祿山，寵愛楊貴妃，致使姦邪進賢士隱，武臣跋扈，國事日非。

李林甫自開元二十四年（七三六）用事，「蔽塞人主視聽，自專大權」<sup>⑨</sup>，凡

⑥⑦章學誠《章氏遺書》卷十三《元次山集書後》，台灣大通書局。

⑧錢基博《中國文學史》上册，海國書局，頁三三九。

⑨《資治通鑑·唐紀三十·玄宗開元二十四年》。

上書言事者皆黜去，阻絕諫諍之路。其人城府深密，莫窺涯際，好以甘言啗人，而陰中傷之，不露辭色。「有堂如偃月，號月堂。每欲排構大臣，即居之，思所以中傷者。若喜而出，即其家碎矣。」<sup>⑩</sup>雖老姦巨滑，無能逃其術者。林甫居相十九年，市權固寵，「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、勢位將逼己者，勢百計去之，尤忌文學之士。」<sup>⑪</sup>故天寶六年，玄宗欲廣求天下士，李林甫卻玩弄試務，盡黜布衣之士，上表賀「野無遺賢」，不僅扼殺元結、杜甫等應試賢才仕進謀國之希望，亦嚴重斲傷唐政之生機。

安祿山體格充肥，腹垂過膝，外若癡直，內實狡黠。善諛媚，賄賂往來使者，人多盛稱其賢。加以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，尊寵間己，乃請專用蕃將，故玄宗寵祿山益牢，以至於出入宮掖不禁，或與貴妃對食，或通宵不出，帝亦不疑<sup>⑫</sup>。後兼領三鎮，賞刑已出，日益驕恣；又見武備墮弛，有輕中國之心。掌書記高尚，趁勢為之解圖讖，勸之作亂。祿山於是養驍勇、畜戰馬，於天寶十四年發兵反於范陽，煙塵千里，鼙鼓動地。其後史思明父子繼亂，前後為禍八年，唐政從此一蹶不振。

經戰亂長期蹂躪，州縣殘破，「荒草千里，是其疆畝；萬戶空虛，是其井邑；亂骨相枕，是其百姓；孤老寡弱，是其遺人。」<sup>⑬</sup>兼以「攤戶」之弊，逃亡愈多，攤稅愈重，米價愈貴，生計愈艱。《廿二史劄記》「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」條云：「貞觀時，斗米三錢。玄宗東封泰山之歲，東郡米斗十錢，青、齊米斗五錢。自安史之亂，兵役不息，田土荒蕪，兼有攤戶之弊。……由於均攤逃戶，十家之內，五家逃亡，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，如石投井，不到底不止。是以逃亡愈多，耕種愈少。代宗永泰之年，京師斗米一千四百。畿甸採穗以供宮廚。至麥熟後，市有醉人，已詔為祥瑞。較貞觀、開元時，幾至數十百倍。」<sup>⑭</sup>故元結於〈左黃州表〉中慨嘆：「於戲！天下兵興，今七年矣！河淮之北，千里荒草；自關以東，海濱之南，屯兵百萬，不勝征稅。」於〈時議〉中哀憫：「今天下殘破，蒼生危急，受賦役者

⑩《新唐書》卷二二三上，姦臣上〈李林甫傳〉。

⑪《資治通鑑·唐紀三十一·玄宗天寶六載》。

⑫《新唐書》卷二二四下，逆臣上〈安祿山傳〉。

⑬《新校元次山集》卷七〈請省官狀〉。

⑭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卷二十。

多寡弱貧獨，流亡死生，悲憂道路，蓋亦極矣。」實深有感於戰禍、賦役交逼下生靈塗炭也。

至於次山所處時代之文風，乃是駢儷之習未褪，古文生面漸開之過渡期。自初唐史官李百藥、魏徵、令狐德棻、李延壽、姚思廉等，鑑於南朝雕琢蔓藻，「流蕩不已，迄於喪亡」<sup>⑮</sup>之教訓，多秉宗經尊聖，輔佐教化之文學觀。其後，陳子昂力矯五百年來「文章道弊」，主張恢復興寄精神與「漢魏風骨」。開元、天寶之際，蕭穎士自述「平生爲文，格不近俗，凡所擬議，必希古文」，「經術之外，略不嬰心」<sup>⑯</sup>，摒棄魏晉以來之駢文；李華標舉「文章本乎作者，而哀樂繫乎時。本乎作者，六經之志也；繫乎時者，樂文武而哀幽厲也。」<sup>⑰</sup>認爲爲文當宗經明道，化民成俗，崇尚簡易，文質相濟。蕭、李等人於古文運動之理論建設，自有其功績，惜其創作未足以繼。錢基博謂：「穎士及華，碌碌麗辭，猶嫌滌洗不盡，不如元結之瘦硬通神，範經鑄子，務剗綺靡以臻於簡古不蹈襲。」<sup>⑱</sup>則知乘此風雲際會，而能以傑出之古文創作，「爲中唐古文運動鋪下坦途」<sup>⑲</sup>者，次山之功也。

### (三) 文學觀

由於處身奸邪弄權，政局日非之時代，次山一生徘徊於仕與隱之岔路，而其思想亦兼具儒家之熱情淑世與道家之消極遜世。表現於文學觀上，便是以道家之辭，寫儒家之情，即是在內容方面，以「救時勸俗」爲依歸；形式方面，則追求簡古自然。

次山於〈文編序〉中，嘗自述其創作歷程云：

……雙方年少，在顯名跡。切恥時入諂邪以取進，姦亂以致身，徑欲填陷於方正之路，推時人於禮讓之庭。不能得之，故優游於林壑，快恨於當世。是以所爲之文，可戒可勸，可安可順。……爾來十五年矣，更經喪亂，所望全活，豈欲跡參戎旅，苟在冠冕，觸踐危機，以爲榮利？蓋辭謝不免，未能逃命，故所爲之文，多退讓者，多激發者，多嗟恨者，多傷閔者，其意必欲勸之忠孝，誘以仁惠，急於公直，守其節分，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！

<sup>⑮</sup>王通《中說·王道》。

<sup>⑯</sup>《全唐文》卷三二三〈贈韋司業書〉。

<sup>⑰</sup>《全唐文》卷三一五〈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〉。

<sup>⑱</sup>錢基博《中國文學史》上册，頁三三七。

<sup>⑲</sup>羅聯添《唐代文學論集》上册〈隋唐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〉，學生書局，頁二〇〇。

可見其早年固以「填陷於方正之路，推時人於禮讓之庭」為職志，為文旨在戒、勸、安、順；經歷喪亂之後，感慨益轉深沈，所為之文，於情雖有退讓、激發、嗟恨、傷閔之異，於意則仍以忠孝、仁惠、公直、節分為勸，冀能匡導時俗，拯救時弊。

次山個性清真簡樸，以古為尚，故文辭宗自然，斥淫靡。〈劉侍御月夜讌會序〉云：「於戲！文章道喪蓋久矣，時之作者，煩雜過多，歌兒舞女，且相喜愛，系之風雅，誰道是邪？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，為後生之規範，今夕豈不能道情達性，成一時之美乎？」可見其平生親風雅，尚古道。至其為文，「綿遠長大，以自然為祖。」<sup>⑩</sup>「辭義幽約，譬古鐘磬不借於俚耳而可尋玩」<sup>⑪</sup>、「高古淳樸，唐賢鮮有能及之者」<sup>⑫</sup>，以自然、幽約、高古淳樸概括次山之人格與風格，頗近之矣。

### 三、元結寓言之諷諭主題

次山於〈二風詩論〉謂其詩「欲極帝王理亂之道，系古人規諷之流」，於〈系樂府十二首〉序其作旨在「上感於上，下化於下」，於〈春陵行〉言其意在仿國風「達下情」。其寓言作品與此類詩作，同樣秉持諷諭精神，實踐其救時勸俗之文學主張。歸納次山寓言之內容、主題，大抵不外三端：於上則陳諭治道、譏刺官吏；於下則針砭時俗，規諷時士；於己則寓懷抱，鳴不平。

#### （一）陳諭治道

〈二風詩序〉云：「天寶丁亥中，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，著《皇謨》三篇、《二風詩》十篇，將欲求于司甄氏以裨天監。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，於是歸於州里。」《皇謨》三篇（〈元謨〉、〈演謨〉、〈系謨〉），假設古者純公與天子之對話，闡論國家頹弊以昌、頹弊以亡之理，乃次山政治思想之系統呈現。

〈元謨〉論頹弊以昌之道：「上古之君，用真而恥聖，故大道清粹，滋於至德，至德蘊淪，而人自純；其次用聖而恥明，故乘道施教，修教設化，教化和順，而人從信；其次用明而恥殺，故沿化興法，因教置令，法令簡要，而人順教。」而頹弊

<sup>⑩</sup>李商隱〈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〉，收於清編《全唐文》卷七七九。

<sup>⑪</sup>參晁公武《邵齋讀書志》卷四上，別集類《元子》十卷條。

<sup>⑫</sup>同<sup>⑩</sup>

以亡之道，則在於衰世之君，先嚴而後殺，繼者先殺而後淫，繼者先淫而後亂，以至「乘暴至亡，因虐及滅，亡滅兆鍾，其下憤凶。」〈演謨〉則推演其故：「頽弊以昌之故，其由上古強毀純朴，強生道德。」「頽弊以亡之故，其由中古轉生澆眩，轉起邪詐。」認為風俗教化，由上古之真、聖、純朴至中古之淫、亂、邪詐，彌近彌衰。其政治觀與其文學觀，同樣具有強烈之尚古、復古色彩，而其對當代風衰俗敗之不滿，亦不言可喻。在《系樂府》第一首〈思太古〉中，次山描寫太湖居民「嬰孤寄樹顛，就水捕鰓鱸。所歡同鳥獸，身意復何拘？」之生活，無拘無牽，逍遙自在，歡同鳥獸，正是次山嚮往之理想國。

次山主張治國之道在於昏愚自守，返朴歸真，自然無為，「聖人須極道於常臣，賢人須滋德於庸君」（〈演謨〉），故〈系謨〉中皇皇提出理政化民十六事，以諷諭時君，而歸本於儉樸慈惠。十六事分別為：道德在清純玄粹，不可慝會盪曠；風教在仁慈諭勸，不可沿以澆浮；衣服在禦於四時，不可積以繡綺；飲食在備於五味，不可煎熬珍怪；器用在絕於文采，不可駢細珠貝；宮室在省費財力，不可殫窮土木；苑囿在合當制度，不可牆塹肥饒；賦役在簡薄均當，不可橫酷繁聚；刑法在大小必當，不可煩苛暴急；兵甲在防制戎夷，不可怙恃威武；畋獵在順時教校，不可騁於殺害；聲樂在節諧八音，不可耽喜靡慢；嬪嬙在備禮供侍，不可寵貴妖豔；任用在校掄材能，不可授付非人；郊祀在敦本廣敬，不可淫慢禱祈；思慮在慎於安危，不可沈溺近習。順之為明聖之君，逆之為凶虐之主。可謂語語針對時弊，治具畢張。惜李林甫弄權斥賢，次山治國之宏規遠略無由上達天監。

何以次山嚮慕太古社會無爭、無為之境界？蓋社會之動亂，政治之敗壞，起於貪權者好爭，貪財者好奪！若統治者能摒棄爭奪之心，社會自然純朴清明。可惜太古生活已不復可尋，「吾行遍九州，此風皆已無。」（〈思太古〉）放眼所見，是爭相賊虐之豺狼虎豹。〈時規〉藉漫叟及中行公（蘇源明）之祝願，嘲諷時權之爭奪、貪暴，陷百姓於饑寒勞苦，語勢悲憤頓挫：

乾元己亥，漫叟待詔在長安，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。中書有醇酒，時得一醉。醉中，叟誕曰：「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，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。」

中行公聞之歎曰：「子何思不盡耶？何不曰：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，分封

君臣父子兄弟之爭者，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？何不曰：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，溢於王者府藏，滿將相權勢之家，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？」叟聞公言，退而記之，授於學者，用為時規。

可見社會之動亂，肇因於君臣之爭國鬥殺；百姓之流離死難，肇因於王公將相之欲壑無邊。因此，唯有去貪、無爭，才能息亂止暴。然欲時人去爭奪、存禮讓，無異緣木求魚，漫叟乃因酒起興：願窮鳥獸蟲魚、醇酎美色以充殺者、欲者之心；中行公更進而祝願：九州億萬、貨寶無數，以滿足爭者、貪者之欲。二者實皆假託不可能實現之祝願，寄託深刻之反諷。

## （二）規勉時士

教化之披於民，如風行草偃，上行下效。惜次山所處之時代，乃風教日衰，時俗益壞之世。〈時化〉中次山慨嘆：「於戲！時之化也，道德為嗜欲化為險薄，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，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，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」，「時之化也，性情為風俗所化，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；聲呼為風俗所化，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解；顏色為風俗所化，無不作姦邪蹙促之色。」批判當世道德險薄、仁義淪喪，乃至於人心之狡詐，表現於聲呼、顏色之諂媚姦邪……，可謂針針見血，沈痛至極！而其寓言作品：〈寤論〉、〈丐論〉、〈心規〉、〈戲規〉、〈處規〉、〈出規〉、〈惡圓〉、〈惡曲〉等，便皆以刺時規士為主題。

〈寤論〉藉郃侯夷奴假為寤言，說侯之過，使郃侯及時改過而免禍，諷刺時士只知苟合當道，不敢匡諫，曾不如卑賤之夷奴！〈丐論〉則巧設問答，譏斥時士自命高尚，羞與丐者為友；實則其言行動靜，無所不丐，較丐者更為不堪：

天寶戊子中，元子遊長安，與丐者為友。或曰：「君友丐者，不太下乎？」對曰：「古人鄉無君子，則與雲山為友；……丐者今之君子，吾恐不得與之友也。……」

吾既與丐者相友，喻求罷，丐友相喻曰：「子羞為丐耶？有可羞者，亦曾知之未也。嗚呼！於今之世有丐者：丐宗屬於人、丐嫁娶於人、丐名位於人、丐顏色於人。甚者，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佞，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，……更有甚者，丐家族於僕圉，丐性命於臣妾，丐宗廟而不取，丐妻子而無辭，有如此者，不為羞哉？吾所以丐人之棄衣，丐人之棄食，提甕倚杖，在於路旁，

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！不然，則無顏容行於人間。夫丐衣食，貧也；以貧乞丐，心不慙，跡與人同，示無異也，此君子之道。君子不欲全道耶？幸不在山林，亦宜具鬻杖隨我，作丐者之狀貌，學丐者之言辭，……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。」於戲！丐者言語如斯，可編爲丐論，以補時規。

首段藉作者結交丐者之舉動，及其「丐者今之君子」之特異論點以蓄勢；然後透過丐者丐論，縱勢申說，指出丐者之丐衣丐食，乃「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」，而天下之人，丐宗屬、丐嫁娶、丐名位、丐顏色、……幾無人能遁逃於「丐幫」。舉世滔滔，既皆爲丐，則作者既不丐衣食，又不丐宗屬名位等等，豈不成爲「異類」？豈不有違「君子之道」？故最後丐者勸作者學爲丐，以免爲流俗所不容！全文正話反說，逆入順出，徹底揭去「時士君子」之虛偽面具，將彼輩搖尾乞憐之行徑，罵得痛快淋漓，千載之下猶令人稱快。《孟子·齊人章》中寫「乞食墮間」而驕其妻妾之齊人，以諷刺世之求富貴利達者；元結〈丐論〉亦借丐者以斥刺丐求無度之人，二篇足以前後輝映矣。

「規者，臣下相互規諫者也。」<sup>②</sup>次山〈心規〉等四篇，旨在以「得志則方正忠信以顯榮，不得志則介潔靜和以終老」之處世態度，自規規人。〈心規〉藉元子以自主雲山林泉，口鼻耳目爲樂，勸人當封包裹塞，勿妄言聽，以免招致滅身亡家。〈戲規〉寫元子因戲言而使牧童遭田夫鞭責，戒人勿「苟戲似非」。〈處規〉論人既隱居行道，當藏智全璞，忘懷是非。〈出規〉則勉人既思爲仕，當以正直忠謙之「社稷之臣」自期，於四篇中最爲膾炙人口：

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，及還，元子問之曰：「爾去我久矣，何以異乎？」諾曰：「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，見權貴之盛，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，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。不數月，自王公大夫卿相近臣之門，無不至者。及一年，有向與歡宴，過之可弔；有始賀拜侯，已聞就誅。豈不裂封，疆土未識；豈無印綬，懷之未暖。其容得祿位者隨死，得金玉者皆斃，參遊宴者或刑或免。叔將之身，如犬逃者五六，似鼠藏者八九。當其時，環望天地，如置在杯斗之中。」

元子聞之，嘆曰：「叔將，汝何思而爲乎？汝若思爲社稷之臣，則非正直不進，非忠諫不言，雖手足斧鉞，口能出聲，猶極忠言，與氣偕絕；汝若思爲

<sup>②</sup>徐師曾《文體明辨·序說》。

祿位之臣，猶當避赫赫之路，晦顯顯之機，如下廐粟馬，齒食而已。……」前段藉叔將敘述自己出遊長安，驚心動魄之經歷，揭示富貴功名之虛幻無常。初出茅蘆者乍見京師權貴之盛，「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」，過齷齪卑陋之生活，故亟思緣登進，汲汲奔走於公卿近臣之門。然而，爬高者必陷於危墜，「有向與歡宴，過之可弔；有始賀拜侯，已聞就誅。豈不裂封？疆土未識；豈無印綬，懷之未暖。」以極度夸飾之詞，強力表現富貴功名的確如回頭轉瞬，迅即消逝，才到手，命已喪，何其諷刺！後段，元子提供叔將兩條仕路：一為社稷之臣，忠謙正直，不避斧鉞——留名百世之路；一為祿位之臣，人微官卑，齒食苟活——留命百年之路。值得有意問津者三思。

次山既以「正」「直」自勉勉人，故於「圓」「曲」深惡痛絕，此其所以有〈惡圓〉、〈惡曲〉之作。〈惡圓〉由乳母為圓轉之器以娛悅嬰兒一事，導發友人公植惡圓之論：「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：『寧方為阜，不圓為卿；寧方為污辱，不圓為顯榮』，其甚者，則終身不仰視，曰：『吾惡天圓』。或有喻之以『天大無窮，人不能極，遠視四垂，因謂之圓。』對曰：『天縱不圓，為人稱之，我亦惡焉！』……入門愛嬰兒之樂圓，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，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，動圓靜圓以終身乎？」意在借過激之言，矯正時人圓滑奉承，隨俗浮沈之劣行。〈惡曲〉寫元子與鄰里會，因曲全當時之歡，以順長老之意，東邑全直之士恐曰：「若能苟曲於鄰里，強全一權，豈不能苟曲於鄉縣，以全言行；能苟曲於鄉縣，豈不能苟曲於邦國，以彰名譽；能苟曲於邦國，豈不能苟曲於天下，以彰德義。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，豈有鍾鼎不入門，權位不在己乎？」小為大之漸，微為顯之幾，能曲於權顏，擴而推之，必曲於權位，故古之惡曲者「不曲臂以取物，不曲膝以使坐」；今全直之士「未嘗曲氣以轉聲，曲辭以達意，曲步以便往，曲視以回目。」亦是藉聳動之論調，規諷時士以精粹之正直美德立身，未可以迂闊視之。

### （三）寄寓襟懷

次山個性耿介，與時俗之曲圓、淫靡椎擊扞格。早年隱居商餘，與靈山林泉為友，作〈訂司樂氏〉自喻為韻諧水樂之全聲，感慨世無知音全士賞愛，此元遺山所謂：「浪翁水樂無宮徵，自是雲山韶濩音。」<sup>②</sup>晚年見呼為漫郎、漫叟，作〈漫論

<sup>②</sup>元好問〈論詩絕句〉三十首之十七。

＞，於百家之外自立「漫家」，充分表現其任真自然之性情。

〈訂司樂氏〉中，元子耽愛南磻之懸水，乃呼懸水淙石之聲爲水樂；樂氏請觀學，元子使門人以懸水指之，樂氏醜惡慢罵而去。元子慨然嘆：「懸水淙石，宮商不能合，律呂不能主，變之不可，會之無由，此全聲也。……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，絲竹之流妙，商宮角羽，豐然迭生，以化全士之耳。」樂氏喜金石絲竹，元子則愛自然天籟，此其所以不諧流俗也。〈漫論〉中之規檢大夫與司樂氏一樣，同爲世俗禮教規範、框架之人：

世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：「公漫然何爲？」對曰：「漫爲公也。」  
「漫何以然？」對曰：「漫然。」規者怒曰：「人以漫指公者，是他家惡公之辭，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爲？漫何規檢？漫何操持？漫何是非？漫不足準，漫不足規；漫無所用，漫無所施；漫也何效？漫焉何師？公髮已白，無終惑之！」

叟俛首而謝曰：「吾不意公之說漫而至於此，意如所說，漫焉足恥？吾當於漫，終身不羞，著書作論，當爲漫流。於戲！九流百氏，有定限耶？吾自分張，獨爲漫家。規檢之徒，則奈我何？」

漫叟崇尚自然，故不喜規檢束縛。唯次山之「漫」，並非放浪形骸，漫無準繩；而是以「介直方正」之品格爲基礎，發展出來之疏放浪漫、樸實真誠之生活型態。因其行爲舉止已有充分之內在道德自律，故一切外在禮法制約乃顯得多餘擾人。次山對處士張季秀「介直自全，退守廉讓；文學爲業，不求人知。寒餒切身，彌更守分。」（〈舉處士張季秀狀〉）備加讚譽，其理在此。

次山晚年另作有〈茅閣記〉、〈菊圃記〉二篇寓言小品，由壯歲之辭激意切，憤世嫉邪，至此則轉爲語重心長，蘊藉深遠。〈菊圃記〉云：

春陵俗不種菊，前時自遠致之，植於前庭牆下。及再來也，菊已無矣。徘徊舊圃，嗟嘆久之。

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，在藥品是良藥，爲蔬菜是佳蔬。縱須地趨走，猶宜徙植修養，而忍蹂躪至盡，不愛惜乎？於戲！賢士君子，自植其身，不可不慎擇所處，一旦遭人不愛重，如此菊也，悲傷奈何？

於是更爲之圃，重畦植之。其地近讌息之堂，吏人不此奔走；近登望之

亭，旌麾不此行列。縱參歌妓，菊非可惡之草；使有酒徒，菊爲助興之物。爲之作記，以託後人，并錄藥經，列於記後。

作者以菊植於前庭而遭人蹂踐，植於堂後而供人賞愛之事，體悟「賢士君子，自植其身，不可不慎擇所處。」於叢爾短製中，冶記事、抒情、論理於一爐，由親歷之事引發親悟之理、親切之情，特別真摯有味。君子當慎擇所處，可進則進，當退則退；若戀棧權位，委曲求全，則何異於菊之遭踐於前庭？若退處林泉，順性自適，亦猶菊之吐芳於堂後，故菊圃實爲次山襟懷之表白，而思有以勉諭時士也。

〈茅閣記〉述孟士源鎮湖南將二歲，因衡陽暑濕鬱蒸，作茅閣以庇其清陰，扇和爽氣。次山從而念及「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，誰似茅閣，蔭而麻之？」「賢人君子爲蒼生之麻蔭，不如是耶？」其憂時憫人之情，與杜甫〈茅屋爲秋風所破歌〉中所嘆：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，同樣充滿熾烈之人道精神。

#### 四、元結寓言之寫作特色

##### （一）篇製：獨立成篇與組篇型態

唐代以前之寓言，無論是諸子寓言或佛經寓言，大多爲長篇中之短小片段，作爲論事說理之媒介，寓言故事居於「穿插性」、「解釋性」、「證明性」之附庸地位，本身並未獨立成篇。初唐、盛唐以來，寓言作品雖多少仍受諸子、佛經寓言之沾溉，而更重要者，乃是受古運動影響，以古文之體製創作寓言，使寓言取得獨立成篇之地位。首先大量創作獨立成篇寓言之作家，論者多推柳宗元，實則當爲元結。元結所作寓言約二十篇，除極少數爲穿插性寓言外（如〈與韋洪州書〉中插敘之「泗上鄰家」故事），其餘多獨立成篇。

寓言取得獨立地位，固然有其發展上之意義；然因篇幅侷限，有時勢不能暢所欲言，乃以組篇型態彌縫之。組篇寓言，分則形式獨立，合則主題共通，如瓣之環蕊，輻之同轂，相輔相成。次山《皇謨》三篇、二論（〈寢論〉、〈丐論〉）、四規（〈心規〉、〈戲規〉、〈處規〉、〈出規〉）、二惡（〈惡圓〉、〈惡曲〉）等四組作品，皆具組篇寓言型態。各組作品雖不若劉禹錫《因論七篇》、柳宗元《三戒》、蘇軾《二魚說》等，於篇前有「序」，總提主旨<sup>25</sup>，而其命題謀篇用意則相似也。

次山之組篇寓言，《皇謨》三篇屬順承關係，〈元謨〉標舉大端，〈演謨〉演述義蘊，〈系謨〉條陳治道，層層遞進；其餘三組屬並列關係：二論分別藉癩婢、乞丐以反襯寄諷；四規分別就修心、戲言、隱處、出仕四事規諭勸誡；二惡則黜圓、曲之人，勉方、直之士。其構成組篇，皆具有凸顯主題，相得益彰之效。

此外，次山於《元子》中之寓言，皆以「元子」作為貫串各篇之主人翁，其後劉禹錫《因論七篇》中之劉子、託名蘇軾所作《艾子雜說》中之艾子、劉基《郁離子》中之郁離子、宋濂《龍門子凝道記》中之龍門子、蘇伯衡《空同子警說》中之空同子，其身份與作用皆與元子同。

## （二）體裁：因體成篇與創體立篇

次山寓言之體裁，主要有謨、論、規、記、惡等。其中，謨、論、記等為因體，規、惡則為創體。

「謨」乃上古陳治國之策之上書。清吳曾祺《文體芻言》云：「謨，謀也，臣子以其所謀舉以入告也。自《尚書》以下無所見，唐人元次山始效為之。猶之北周人擬〈大誥〉、唐人之補《逸周書》也。其詞力求古奧，以期與三代以前相類。」<sup>②⑥</sup>謨為《尚書》六體之一，其後無有繼作，至次山始效其體而為〈元謨〉、〈演謨〉、〈系謨〉，假託遠古君臣之對話，以陳論治國之策，文詞雖不免過於古奧，形式則仍有可稱。以謨體老樹結合寓言新株，其尚古之志可知。

「論」之立名，始於《論語》，劉勰《文心雕龍·論說》篇中有四品八流之分，明人徐師曾則謂：「詳勰之說，似亦有未盡者。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，諷（諷人）寓（寓己）則與箴解同科，設辭則與問對一致，必此八者，庶幾盡之。」並將論分為八品：一曰理論，二曰政論，三曰經論，四曰史論，五曰文論，六曰諷論，七曰寓論，八曰設論。<sup>②⑦</sup>依諷以諷人，寓以寓己之別，則次山〈癩論〉、〈丐論〉二篇，可視為諷論體寓言。

<sup>②⑥</sup>劉禹錫《因論七篇》序：「劉子閒居，作《因論》，或問其旨曷歸歟？對曰：因子為言，有所自也。……造形而有感，因感而有詞，匪立匪寓，以因為目，《因論》之旨也。」柳宗元《三戒》序：「吾恒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。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迫于禍。有客談麋驢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《三戒》。」蘇軾《二魚說》序：「予讀柳子厚《三戒》而愛之，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，欲蓋而彰者，游吳，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，作《二說》，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，亦聊以自警。」

<sup>②⑦</sup>見《涵芬樓文談》附錄《文體芻言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頁十七。

<sup>②⑧</sup>同<sup>②⑦</sup>

「記」者，紀事之文也。吳訥《文章辨體·序說》引真德秀云：「記以善敘事爲主。《禹貢》、《顧命》乃記之祖。後人作記，未免雜以議論。」又謂：「記之名，則始於《學記》，厥後揚雄作《蜀記》，而《文選》不列其類，劉勰不著其說，則知漢魏以前，作者尚少，其盛自唐始也。」後人作記而雜以議論，李華《鸚鵡執狐記》已然，次山《菊圃記》、《茅閣記》則不唯夾敘夾議，而且抒懷記感，爲託物寓意之作。

「規」爲次山創體。徐師曾云：「按字書云：『規者，爲圓之器也。』《書》曰：『官師相規』，言規其闕失，使不敢越，若木之就規也。……規之爲名，雖見於《書》，而規之爲文，則漢以前絕無作者。至唐元結始作《五規》，豈其緣《書》之名而創爲此體歟？」<sup>28</sup>吳曾祺亦云：「此體古無所師，唐人以意爲之。」<sup>29</sup>次山取規過勸善之義，運用故事形式，創作《心規》、《戲規》、《處規》、《出規》、《時規》等，於寓言體裁之開拓卓有重獻。

「惡」乃「規」之反言見義，惡圓、惡曲，正所以規方、規直也。惟以「惡」名篇者，古來作品絕少，故未被視爲一獨立文體。

### （三）題材：取材於現實生活

寓言之題材，包括歷史故事、社會事件、神鬼傳說，乃至動物、植物、器物故事等，作者以此題材爲基礎，加入虛構、想像之成份，賦予諷諭、啓發功能。

次山寓言以於現實生活周遭之社會人事爲主，故其篇首，往往記錄事件之時間背景，如《癩論》：「元子天寶中曾預譙於諫大夫之座，酒盡而無以續之。……」《喻友》：「天寶丁亥中，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，皆得詣京師就選。……」可見其時爲己所遭逢之時；有時則寫家居尋常之事，如《惡圓》云：「元子家有乳母，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，嬰兒喜之，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。……」《惡曲》云：「元子時與鄰里會，曲全當時之權，以順長老之意……」皆以親身之經歷發端敘事，引起下文，逐步導入主題，點明諷意，如同佛祖現身說法，極爲親切。

不過，寓言以現實生活、親身經歷爲背景，故事中徵實成份增加，想像空間相對縮小，難免較缺令馳騁之思致與活潑之趣味；而且，因爲虛構成份較少，作者與

<sup>28</sup>同<sup>29</sup>，頁四十一。

受諷諭者之間，不易保持客觀、理性之距離，故而作者有時情緒一發不可收拾，愈寫愈憤激。李商隱於〈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〉云：「次山有《文編》，有《後集》，有《元子》，……作官不至達，母老不得盡其養，母喪不得終其哀，間二十年間，其文危苦激切，悲憂傷酸於性命之際。……」次山寓言之取材，與其生活經歷、風格形成皆有密切之關係。就今日所存見之次山寓言作品而言，絕大部份取材於社會現實，此為其特色。

#### (四) 風格：由古質、激切到自然淳樸

影響風格之因素，包括作者之才氣學習與作品之文體性質。就前者言，次山秉性率直純正，而遭世亂俗衰，與物多忤，方鑿不容於圓柄，其憫俗憂世之懷，發為文章，不免慷慨激烈；就後者言，寓言既以寄託理道，婉言諷勸為依歸，則於社會人事之缺弊，自有刺譏針砭存焉，次山寓言作品之風格，便是以激切諷刺為主調。

若析而言之，則其生平三階段，亦自然形成寓言風格之三個不同分期：早期（天寶六年詣京師就選以前）以《皇謨》三篇為代表，時次山涉世不深而一心求用，思託言古道以諭今上，文辭稍流於纖碎詰屈，風格則近於古質；中期（天寶六年至廣德元年，次山三十至四十五歲間）為次山寓言創作之主要時期，時亂禍將至而奸邪當道，正直之士無法力挽狂瀾，與生靈同遭流離之苦，故所作寓言，出語奇警而風格特為激切；晚年所作，以〈菊圃記〉、〈茅閣記〉為代表，時浮沈已久，感懷已由頓挫而趨於煙澹，風格亦由亢激怨懟而趨於自然淳樸。

### 五、餘論

次山抱負弘遠，著述甚勤，據其自著序記及歷代書志，可知其著作有《異錄》、《元子》、《文編》、《猗犴子》、《浪說》、《漫記》、《元次山集》等七種，並編有《篋中集》，惜除所著《元次山集》及所編《篋中集》外，其餘原書皆已不存。除因倥傯兵亂，輾轉散佚外，孫昌武先生認為係因次山在表現形式上，喜用諷刺筆法，內容上有些荒誕不經，有傷儒家溫良忠厚之正統觀念，以致部份創作被後人刪削而未流傳下來<sup>⑩</sup>。宋代道學家尤其不能容忍次山意涉「譎誕」之作，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十四便云…

<sup>⑩</sup>孫昌武《唐代古文運動通論》，百花文藝出版社，頁七十五。

……又有《元子》十卷，李紆作序，予家有之，凡一百五篇。其十四篇已見於《文編》，餘者大抵澶漫矯亢，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事，最為譎誕。其略云：方國之僇，盡身皆方，其俗惡圓。設有問者曰：「汝心圓？」則兩手破胸露心，曰：「此心圓耶？」圓國則反之。言國之僇，三口三舌；相乳國之僇，口以下直為一竅。無手國，足便於手；無足國，膚行如風。其說類近《山海經》，固已不韙。至云：惡國之僇，男長大則殺父，女長大則殺母；忍國之僇，父母見子如臣見君；無鼻之國，兄弟相逢則相害；觸國之僇，子孫長大則殺之。如此之類，皆悖理害教，於事無補。次山《中興頌》與日月爭光，若此書不作可也。惜哉！<sup>①</sup>

這類睿方國故事，想像詭奇，頗具文學價值，卻因違逆「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」之觀念，而被指斥為「澶漫矯亢」、「悖理害教」，殊欠公允。故章學誠云：「洪氏謂其《元子》十卷，悖理害教。今觀洪氏所舉睿方二十國事，是亦憤世嫉邪之意，不以文害辭，自亦無傷。」<sup>②</sup>孫昌武亦云：「洪邁是一位博學多聞的大學問家，但在評論元結的睿方國的寓言時卻囿於偏見。實際這些『譎怪』之詞正有諷世的用意，且很能表現出次山思致的大膽與寫法的奇拔。」<sup>③</sup>皆能跳出迂腐之理學泥沼，從文學、寓言之立場，給予公允之評價。不過，洪氏略舉二十國之事，令人稍窺其鼎鬻梗概，亦有德於次山也。惜次山不知有多少「譎誕」之作，湮沒於偏見之洪流？即以《元子》而言，據洪邁云原書「一百五篇」，今則僅存約二十篇，其散佚之嚴重亦可知矣！否則，其寓言題材必更為廣闊，內容必更為豐富。

「唐之古文，自結始，至愈而後大成也。」<sup>④</sup>唐之寓言，亦自結始，至韓、柳而後大成。錢基博謂：「韓愈、柳宗元之有元結，猶陳涉之開漢高，項羽乎！」<sup>⑤</sup>自古文及寓言之立場，皆為探源之論。宋自高似孫於《子略》中嘗謂：唐代文人惟次山、子厚二公而已<sup>⑥</sup>，假令元子著述俱存，則其寓言之所成就，足以「與柳州頡頏上下」<sup>⑦</sup>，豈不可能哉？

①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卷十四，「元次山《元子》」條。

②同⑥

③同④

④宋董道《廣川書跋·磨崖碑》。

⑤錢基博《中國文學史》上册，頁三四〇。

⑥高似孫《子略》卷四云：「……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，其視柳柳州又英崛，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。」收於《新校元次山集》附錄三。

⑦章學誠《元次山集書後》：「次山於文，前人評論已詳。……高氏《子略》取與柳州頡頏上下，似為得之。」